臺大歷史學報第 65 期
2020 年 6 月，頁 225-243

BIBLID1012-8514(2020)65pp.225-243
2019.10.7 收稿，2019.12.31 通過刊登
DOI: 10.6253/ntuhistory.202006_(65).0006

§書評§

評介 Eric Tagliacozzo, Helen F. Siu, and Peter C. Perdue, eds., *Asia Inside Out: Itinerant Peopl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vii+326 pp.

潘　亦　迎*

自年鑑學派興起以來，歷史學家便試圖突破既定框架，以追索新的歷史聯繫與過程。所謂既定框架，包括以重大事件為標識的歷史分期、以「民族—國家」為單元的空間區隔，和基於現代學科體系的方法壁壘。由年鑑學派所開啟的諸多突破，延續至近年興起的「跨國史」、「全球史」等研究脈絡中，針對「亞洲」這一區域概念的歷史化考察及反思，則是這些研究脈絡下的主要支脈。2000 年以來，亞洲研究領域的歷史學家與人類學家試圖在方法上相互借鑒，並將研究視域轉向亞洲各國之間的交流或空白地帶，以呈現主流敘事所忽視的聯繫。然而，這些具體研究往往只能反映一個特定地帶的複雜性，無法為「亞洲」的整體性變動提供宏觀圖景。由達瑞克（Eric Tagliacozzo）、蕭鳳霞（Helen F. Siu）、濮德培（Peter C. Perdue）所編纂的三卷本論文集 *Asia Inside Out*，則試圖從個案走向對「亞洲」的整體性反思。

* 芝加哥大學東亞語言與文明系博士
Wieboldt Hall, Room 301, 1050 East 59th Street, Chicago, IL 60637, USA.
panyiying0918@gmail.com.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sia Inside Out 的前兩卷 *Changing Times* 與 *Connected Places* 先於 2015 年出版，最後一卷 *Itinerant People* 則於 2019 年面世。三卷論文集圍繞著兩個交織的問題：如何反思亞洲作為一個區域的分合？如何追溯「亞洲」這一概念的流變？第一卷 *Changing Times* 探討從 16 至 20 世紀，哪些歷史節點見證了新聯結的建立或社會文化的轉向。第二卷 *Connected Places* 則立足於新文化地理學等思想傳統，反思何種機制曾將「亞洲」所涉及的「空間」（space）轉變成具有特定政治或文化意義的「地方」（place）。[1]第三卷 *Itinerant People* 側重於促成上述「時間」與「空間」轉變的核心動力：人與物之遷移。本文首先概覽 *Asia Inside Out* 全系列對話的研究方法，再討論編者群與論文集的分卷方式，最後介紹 *Itinerant People* 一卷中的篇目，並對該論文集略作評議。

一

「亞洲」的邊界時時處於變動之中，可以重塑這一邊界的，既包括國家層面的政治關係，也包括個體層面的日常習慣。在 *Itinerant People* 的導言中，編者基於觀察上述變動，以「折扇」（folding fan）這一比喻解釋他們對於「亞洲」的理解：「亞洲」並非一個確定的地域單元，而是如折扇一般，會隨著時空的變化與人的介入而呈現出不同的範圍與形態。[2]編者對「亞洲」作此一解讀，實與 1990 年代以來北美人文、社科學界的兩支學術潮流息息相關：其一為針對「區域研究」（Area Study）的反思，其二為通過「空間」這一視角反思「現代性」。

1 Sunil S. Amrith 曾就該系列的前兩卷作詳細書評。參見 Sunil S. Amrith, "Review of *Asia Inside Out: Changing Times* and *Asia Inside Out: Connected Places*,"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21, no. 4 (October 2016, Oxford), pp. 1128-1232.

2 參見 Eric Tagliacozzo, Helen F. Siu, and Peter C. Perdue, eds., *Asia Inside Out: Itinerant Peopl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9), pp. 1, 7, 21.

臺灣大學藝術期刊資料庫

在北美學界，區域研究的興起本為冷戰的產物。自 1960 年代開始，美國政府投入大筆資金贊助對境外各區域的語言、歷史及地理研究。在這股研究熱潮中，由於戰略考量之影響，研究者將世界劃分為蘇聯、東亞、中東等地理區域，並將每個區域視為自洽的文化與歷史共同體。至 1990 年代，隨著冷戰的落幕，區域研究逐漸失去了其戰略必要性；與此同時，研究者亦開始反思：既有的區域概念（如「東亞」或「東歐」）是否過度受制於戰略考量，而未能確實呈現不同區域的地理與文化形態？[3]

同樣自 1990 年代以降，全球化（globalization）開始更為深刻地影響資本與人群的流動。在全球化過程中，空間（小至生活空間，大至國土疆域）的不確定性亦隨之增加，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者因此開始從「空間」這一維度反思現代化進程。一方面，以 David Harvey、Henri Lefebvre（1901-1991）為代表的馬克思主義學者，開始探討「空間」如何能動地塑造人們的日常與社會秩序。[4]另一方面，以 Kären Wigen、Martin Lewis 為代表的地理學家，則試圖解析一系列地理區隔的歷史建構過程，如七大洲的劃分、「東—西」世界的對立等。[5]儘管這些學者分別聚焦於日常生活與地緣政治這兩個不同的領域，他們共同揭示了「空間」的歷史能動性：空間並非被動且一成不變；反之，空間時常塑造並合理化人類社會中的階級與政治差序。這些學者對於「空間」的批判性反思，為「區域」重新回歸人文社科學者的研究視域提供了方法基礎。

---

3 針對區域研究在北美學術界的興起與轉變，參見 Ali Miresepassi, Amrita Basu, and Frederick Weaver, eds., *Localizing Knowledge in a Globalizing World* (Syracuse: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1-14.

4 參見 David Harvey, "The Experience of Space and Time," part 3 in *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 An Enquiry into the Origins of Cultural Change* (Cambridge: Blackwell, 1991), pp. 201-326; Henri Lefebvre,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trans. Donald Nicholson-Smith (Cambridge: Blackwell, 1992).

5 參見 Martin Lewis and Kären Wigen, *The Myth of Continents: A Critique of Metageograph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在 20、21 世紀之交，隨著全球化的挑戰不斷湧現，如世界性的階級分化、恐怖主義等，人們試圖重新理解不同區域的歷史、文化及社會特殊性。在此波對不同地理區域的再認識中，學界開始應對以下問題。首先，如人類學家 Arjun Appadurai 所言，全球化進程使研究者意識到，地方（locality）並非完全獨立於全球化的影響之外。這一認識促使研究者進一步反思應如何衡量「在地」（local）因素與「全球性」（global）因素之間的關係，而非將兩者簡單對立。[6]其次，隨著研究者對於「全球化」的反思加深，他們亦開始思考應如何在研究中避免未經審視的「全球化」思維慣性，如以線性、目的論式的方式呈現全球聯繫加強的趨勢。以 Anna Tsing 為代表的人類學家便提出，追問具體變動（movements）的過程，如新身分認同的形成或特定的跨區域互動，恰恰是避免線性全球化敘事的方法。[7]概言之，自 2000 年以來，人文社會科學研究者更加關注全球性歷史動因（如資本主義擴張、遠距離移民）對於區域邊界、在地特殊性的不斷重塑；研究者也開始思考，具體的區域個案能如何豐富我們對於全球化的理解，而非簡單地確認全球化的進程。在亞洲研究領域，上述反思具體與兩支研究脈絡合流：其一關注以全球為範圍的制度、經濟、文化比較（comparison），其二注重跨國族、跨區域的歷史聯繫（connection）。[8]

6 Arjun Appadurai, “Global Ethnoscapes: Notes and Queries for a Transnational Anthropology,” in *Modernity at Large: Cultural Dimensions of Globalizatio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6), pp. 54, 64.

7 Anna Tsing, “The Global Situation,” *Cultural Anthropology* 15, no. 3 (August 2000, Arlington), pp. 347-350.

8 早在 1970 年代，傅禮初（Joseph F. Fletcher）便提出，歷史學家應跨越地理區隔，以更宏觀的視野探討「早期現代」（early modern）時期的全球「整體史」（integrative history）。他提出對於探討早期現代整體史至關重要的兩個概念：「相互聯繫」（interconnection）與「横向連續性」（horizontal continuity）。具體言之，「相互聯繫」指兩個社會通過商品、思想、制度、宗教的流通而形成的歷史聯結；「横向連續性」指在兩個並不聯結的社會中所平行出現的歷史轉變。傅禮初的思考深遠影響了王國斌（R. Bin Wong）、濮德培等學者對於全球史、跨區域比較等議題的探討。參見 Joseph Fletcher, “Integrative

臺灣人文與社會科學資料庫

在 2000 年前後，王國斌（R. Bin Wong）、彭慕然（Kenneth Pomeranz）等學者，先後嘗試將中國的經濟、制度、社會轉變置於「全球現代國家形成」的議題之下來進行比較。這群學者主要回應兩支學術脈絡：其一為馬克思（Karl Marx, 1818-1883）、韋伯（Max Weber, 1864-1920）所開啟的古典社會理論；其二為布勞岱爾（Fernand Braudel, 1902-1985）、華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 1930-2019）等人圍繞資本主義制度、世界體系所展開的討論。這群學者的共識是：上述兩支學術脈絡均將西歐（尤其是英國）的現代化發展經驗孤立出來，並預設了此一現代化模式向全球擴張的必然性。鑒於此一共識，他們提出唯有通過「雙向比較」（reciprocal comparison），[9]同時考察全球不同核心區（core area）中現代國家形成的不同經驗，才能真正豐富對於「現代化」的討論。

王國斌在其 *China Transformed* 一書中，便嘗試從「經濟轉變」（economic development）、「國家建設」（state formation）、「社會抗爭」（social protest）三個方面，就中國與西歐的發展軌跡進行雙向比較；他還提出全球性的比較應當與追溯全球逐漸聯結的歷史過程相結合。[10]這一方法在彭慕然的 *The Great Divergence* 一書中得到充分發揮。彭氏指出，英國與中國、印度等歐亞大陸核心區的經濟、社會「大分流」，在 19 世紀方始顯現。19 世紀前後，英國、中國江南等歐亞大陸的核心區均面臨了相似的發展困境，如人口膨脹、資源短缺、市場瓶頸等。英國之所以能較為迅速地走出困境，實則基於一個偶然性優勢：對於美洲新世

History: Parallels and Interconnections in the Early Modern Period, 1500-1800," in *Studies on Chinese and Islamic Inner Asia*, ed. Beatrice Forbes Manz (Hampshire: Variorum, 1995), pp. 37-57.

9 所謂雙向比較，即在比較 A 與 B 的過程中，不是簡單的將其中一方作為標準，而是同時考慮 A 與 B 所分別代表的普遍性與特殊性。例如，在追問「中國何以沒有經歷西歐歷史經驗（如工業革命、資本主義、國家－社會權域界定等）」的同時，我們亦需思考「西歐為何沒有走上中國的歷史軌跡」。

10 R. Bin Wong, *China Transformed: Historical Change and the Limits of European Experience*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

臺灣人文學術期刊資料庫

界的開發。新世界不僅為英國提供了充足的自然與人力資源，也提供了一個可以持續擴張的市場。換言之，由於上述偶然性歷史聯結，英國得以建立起一個地域範圍更為廣闊的商貿空間；這個新的空間所促發的挑戰，如對於遠程交通、新舊世界間貿易網絡的調控，推動英國進一步找尋技術（工業革命）、制度（資本主義制度）上的革新。[11]

近年來，不少學者持續從軍事、文化等角度豐富「大分流」學說。歐陽泰（Tonio Andrade）在 *The Gunpowder Age* 中所提出的「兩期軍事大分流」，[12]及張泰蘇在 *The Laws and Economics of Confucianism* 中通過家族形態來討論中、英經濟發展分化的嘗試，[13]均將「大分流」學說所激發的全球比較視野推向了軍事史、法律史等領域。

同樣自 2000 年以降，不少學者積極研究亞洲不同國家之間的歷史聯繫。在 *Sovereignty and Authenticity* 中，杜贊奇（Prasenjit Duara）以滿洲國為例，呈現了國家、區域、世界等地緣格局在 20 世紀上半葉的交互影響。杜贊奇指出，在滿洲國爭取主權的歷史中，我們可以觀察到以下交織的歷史動力：一戰後世界範圍內的民族國家興起浪潮，東亞不同國家對於「東亞現代性」的聲張，以及在地群體對於滿洲生態、文化獨立性的強調。[14]紀若誠（C. Patterson Giersch）則在 *Asian Borderlands* 探討清帝國、暹羅、緬甸之間的帝國邊境自 18 至 19 世紀的演變。紀若誠結合多語種史料，呈現三國官員、貴族、移民等多類主體對於邊地政治、社會、文化格局的塑造。[15]如若杜贊奇與紀若誠所呈現的，更多為鄰近的

11 Kenneth Pomeranz, *The Great Divergence: China, Europe, and the Making of the Modern World Econom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12 Tonio Andrade, *The Gunpowder Age: China, Military Innovation, and the Rise of the West in World Histo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6).

13 Taisu Zhang, *The Laws and Economics of Confucianism: Kinship, Property in Preindustrial China and Englan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14 Prasenjit Duara, *Sovereignty and Authenticity: Manchukuo and the East Asian Modern*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 2004).

15 C. Patterson Giersch, *Asian Borderlands: The Transformation of Qing China's Yunnan Frontier*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臺灣人文學術期刊資料庫

地緣關係所促發的跨國聯繫，卜正民（Timothy Brook）則在其 *Vermeer's Hat* 一書中描摹一幅更為宏大的圖景：由 17 世紀的跨海貿易所打造的全球性聯繫。卜正民以維梅爾（Johannes Vermeer, 1632-1675）等人的 8 幅畫為起點，抽絲剝繭地講述在 17 世紀跨海貿易的洪流下，不再有人是一座孤島。跨國商品、人力流動、調適文化與文明差異等經驗均已滲入時人的日常生活，並將在之後的幾個世紀中愈加深刻地塑造普通人的體驗與思想。卜正民最後指出，此一全球貿易浪潮亦曾促發不少國家限制對外通商的渠道，如日本與中國。[16]

卜氏此一判斷立足於 20 世紀 60 年代以來，學界對於 19 世紀前亞洲各國航海政策的總體認知。然而，近年來，越來越多學者開始關注亞洲海域並反思：在 19 世紀中葉以前，亞洲的海域真的缺乏軍事、商貿及文化交流的活力嗎？他們首先試圖在普通人身上摸索一度被湮沒的亞洲海洋史。在 *Crossing the Bay of the Bengal* 中，Sunil S. Amrith 講述來自印度、中國、緬甸、斯里蘭卡的移民與勞工，如何在 17 至 20 世紀不斷重塑著孟加拉灣的環境、經濟地位、文化形態，以及南亞與東南亞之間的邊界。[17]在 *Sea Rovers, Silver, and Samurai* 中，歐陽泰、杭行等學者指出，若我們將視野由國家政策轉向商人、走私者、海盜等群體，16 至 18 世紀的東亞海域實則同樣見證著活躍的商貿活動與軍事革新。[18]在 2018 年出版的 *The Blue Frontier* 中，布琮任（Ronald C. Po）指出，我們對於 19 世紀前不同亞洲國家的官方海洋政策或許仍知之甚少。以清政府為例，布氏認為 18 世紀的清政府實則對當時的東亞海域有著精準的管理，且其對於海洋的管理與其在歐亞大陸上的擴張密切相關。[19]

16 Timothy Brook, *Vermeer's Hat: The Seventeenth Century and the Dawn of the Global World* (London: Bloomsbury Publishing, 2008).

17 Sunil S. Amrith, *Crossing the Bay of Bengal: The Furies of Nature and the Fortunes of Migrant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18 Tonio Andrade and Xing Hang, eds., *Sea Rovers, Silver, and Samurai: Maritime East Asia in Global History, 1550-1700*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2016).

19 Ronald C. Po, *The Blue Frontier: Maritime Vision and Power in the Qing Empire*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二

儘管上述針對區域及全球化的反思在 21 世紀初便已肇始，要真正通過案例呈現區域與全球化進程之間的互動卻並非易事。*Asia Inside Out* 的三位編者濮德培、達瑞克、蕭鳳霞，正試圖達成這一目的。在編纂本書之前，他們均在各自的專攻領域內，對特定地域邊界的形成、轉變與消逝作過深入研究。

濮德培現為耶魯大學歷史系教授。在其 *China Marches West*（2005）一書中，他追溯 17 至 18 世紀清帝國、俄國與準噶爾在歐亞大陸中心地帶的角逐。該書立足於「邊疆環境」（frontier environment）、「國家建設」（state building）、「民族身分認同」（national and ethnic identity）三重視角，呈現清—俄—蒙邊界地帶在兩個多世紀中波瀾壯闊的生態、軍事、經濟及文化史。以清、俄、蒙邊疆地帶的歷史為基礎，濮德培進而討論帝國間的互動如何在軍事、交通、商貿、社會等多個層面塑造清帝國的國家建設路徑。通過此一討論，濮德培將清—俄—蒙間的紛爭置於全球國家形成的比較視野中，從「國土安全」（security）的角度，為華勒斯坦等人的「世界體系」理論及彭慕然等人的「大分流」理論提供重要補充。尤值注意的是，在該書第四部分，濮德培分別從空間、時間兩個角度，細緻呈現碑銘、地圖與歷史書寫對於邊疆地帶的文化重塑與再現。該部分的視角應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 *Asia Inside Out* 前兩卷的構想。[20]

達瑞克現為康乃爾大學歷史系教授，並曾於耶魯大學接受博士訓練，師承 Ben Kiernan、James C. Scott 與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達瑞克長期關注東南亞地區人群、思想以及物品的流動。在其 *Secret Trades, Porous Borders* 一書中，達瑞克梳理了 1865 至 1916 年間在新加坡、檳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8).

20 Peter C. Perdue, *China Marches West: The Qing Conquest of Central Eurasia*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城等英、荷殖民地邊境的走私貿易。他指出，19、20 世紀之交，殖民政權的邊境管控影響著走私貿易的形態，卻也時常被後者改造；物品流通與明確的國土觀念在此一歷史情境中彼此塑造。[21]達瑞克對於物品與空間的討論豐富了傅柯（Michel Foucault, 1926-1984）、Arjun Appadurai 等人有關國土、人群、物品的理論，亦與 *Itinerant People* 的核心議題息息相關。[22]

蕭鳳霞現為耶魯大學人類學系教授，長期關注中國南方沿海地區的家族、移民與地方認同等議題，並在方法上致力於結合文獻與田野材料。蕭氏曾與柯嬌燕（Pamela K. Crossley）、蘇堂棟（Donald S. Sutton）編纂 *Empire at the Margins*。該書聚焦於「民族」身分的塑造這一議題，呈現 17 至 19 世紀中央政府、地方官員、民眾等多重主體在「民族」構建過程中的互動，並比較中國西北、南方等不同邊疆地帶的「民族」構建過程。[23]該論文集對於「塑造地方」、「塑造身分認同」等議題的關注，及其比較不同邊疆地帶的方法，均與 *Asia Inside Out* 相呼應。自 2001 年以來，蕭鳳霞持續關注將中國置於全球史語境中探討的方法，她曾與美國社會科學研究理事會（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 SSRC）中的 Inter-Asia 項目合作，分別成立了耶魯大學的 Inter-Asia Initiative 與香港大學的香港人文社會研究所。這兩個研究機構均力求通過跨學科的方法與跨區域的視角來豐富理解「亞洲」的範式，與 *Asia Inside Out* 系列的研究旨趣一脈相承。機構中不少成員（三位編者之外），如 Erik Harms、James Pickett、梁其姿、項鑛等，亦參與 *Itinerant People* 的撰文工作。

由上述研究回溯可見，「亞洲內部聯結」、「人與物之流動」、「全

21 Eric Tagliacozzo, *Secret Trades, Porous Borders: Smuggling and State Along a Southeast Asian Frontier, 1865-1915*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9).

22 Michel Foucault, *Security, Territory, and Population*, ed. Michel Senellart, trans. Graham Burchell (London: Picador, 2009).

23 Helen F. Siu, Pamela K. Crossley, and Donald S. Sutton, eds., *Empire at the Margins: Culture, Ethnicity, and Frontiers in Early Modern China*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球比較視野」等方法是三位編者長期共同關注的議題。2000 至 2019 年間，三位編者亦積極搭建相關研究平台。*Asia Inside Out* 系列的出版，既與他們長期以來的學術旨趣密不可分，亦與其在 20 年間搭建對話平台、擴充研究學群的努力相關。正如他們所言，可以匯聚 30 多位學者針對「亞洲」不同地帶的研究成果及方法反思，已是開拓性的學術努力。[24]

三位編者的用心，當然不止於匯聚研究成果；他們亦在探索應如何通過區域更全面、深刻地理解全球聯繫加強的歷史過程。這層方法訴求體現在論文集的標題與分卷方式中。三位編者將系列論文集命名為 *Asia Inside Out*，其用意在於先梳理亞洲內部不同地帶之間的互動過程，並以此為基礎，再反觀「亞洲」何以成為一個區域整體，而其區域邊界又經歷過怎樣的歷史變遷。此一對「內部過程」的重視，亦展現在論文集的分卷方式。第一卷 *Changing Times* 意在追溯亞洲不同地帶之間形成新聯結的歷史時刻；第二卷 *Connected Places* 進而探索在新歷史聯結的影響之下，何種機制將物理性的「空間」轉變為更具文化特殊性的「地方」；第三卷 *Itinerant People* 則聚焦於建立聯結、建構文化認同的歷史主體：人以及隨著人而遷移的物。值得一提的是，上述分卷方式並非簡單地將「亞洲」分合的「內部過程」分解為時間、空間、人群三個主題。相反的，編者群認識到，「亞洲」的分合與變遷牽連著時間、空間、人群三個層次的互動（three-way interactions），無法簡單分割。研究者能做的，是將時間、空間、人群作為特定的視角，並通過這些不同的視角去審視同一個歷史過程的不同面向。

三

Itinerant People 這卷論文集涵蓋了人群遷移所引發的三種效應：商貿流通、知識流轉與日常文化傳播；同時也反思了人群遷移所難以逃脫

24 Tagliacozzo, Siu, and Perdue, *Asia Inside Out: Itinerant People*, p. 2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兩組緊張關係：「遷移與定位」及「自由與束縛」。[25]

本書所探討的一組核心關係「遷移與定位」，主要體現在 Erik Harms 的開篇文章中。人的每次遷徙總有一個新的終點。何種機制促使人由曾經定居的故鄉往外遷徙？何種機制幫助人重新定義故鄉與每一個新終點之間的關係？Erik Harms 從這些問題出發，並基於其對越南移民的研究，為論文集提出了一個核心概念：空間重定（Spatial Fix）。這一概念源自地理學家 David Harvey 對資本主義全球性擴張的批判。[26] Harms 試圖用「空間重定」的視角來理解 20 世紀的越南移民，也以越南移民的案例來豐富「空間重定」這一概念的內涵。Harms 論及，20 世紀的越南移民，皆根源於一種不斷「回歸」的考量：人們希望通過商貿、婚姻所推動的遷徙來為自己的故鄉汲取更多資本，從而強化自身在故鄉社會網絡中的位置；此一移民模式自然受到資本主義全球化的影響，但它也根植於越南的反殖民歷史，及其文化傳統中的家族觀念。因此，在「資本主義擴張」這一機制之外，我們應追溯更多人們遷徙與回歸的原因。

人的遷移常與商貿流通相伴，商貿流通如何影響一個群體的形態？David Ludden 與 Narges Erami 呈現了商貿流通塑造群體的兩種方式。

---

25 在〈前言〉中，編者將本文集涉及的主題歸納為：“Mobility and Fixity,” “The Meaningful Worlds of Circulating Commodities,” “Practitioners, Texts, and Knowledge in Transit,” “Seekers and Unwilling Sojourners ‘at the Margins’,” “Soundscapes, Foodscapes, and Sportscapes”。筆者對這些主題進行了一定的調整，其中 “Mobility and Fixity” 對應「遷移與定位」；“The Meaningful Worlds of Circulating Commodities” 對應「商貿流通」；“Practitioners, Texts, and Knowledge in Transit” 對應「知識流轉」；“Seekers and Unwilling Sojourners ‘at the Margins’” 對應「自由與束縛」；“Soundscapes, Foodscapes, and Sportscapes” 對應「日常文化傳播」。筆者作此調整的考量有二：一是為了更精確地總結單篇文章所反映的將「亞洲」聯結或分化的機制；二是使用在中文語境中更為簡潔的表達。

26 Harvey 認為，資本主義總是在一個具體的地理空間中運作，資本主義內部危機卻又促動它不斷突破已有的空間並進行地理擴張。「空間重定」因而是資本主義全球化過程中一個循環的主題。參見 David Harvey, “Globalization and the ‘Spatial Fix’,” *Geographische revue* 2, no. 3 (2001, Flensburg), pp. 23-30.

臺灣人類學術期刊版權所有

Ludden 考察了一個橫跨中、緬、印的「貝殼王國」在 19 世紀前的運作與消亡。此一王國曾長期游離於中國、印度等農業帝國之外，而貝殼是這個地帶的主要貨幣，無法被任何鄰國或接壤城市的金屬貨幣取代。但自 18 世紀末，由於英屬東印度公司注意到這個地帶的山地資源，殖民官試圖通過農業推廣、稅務管理、族群隔離等政策，擴張其對貝殼王國的控制。這些政策引起原住群體的反抗，並於 1790 年以戰爭收場。此後，東印度公司在貝殼王國的北部高地與南部低地間劃定了明確的政治邊界；原住群體往更偏遠處逃亡，成為治外之民；由貝殼所串聯的開放商貿空間亦隨之消亡。在 Ludden 的個案中，以貝殼為媒介的商貿活動維持了不同群體間較為模糊、開放的邊界；而在 Erami 針對東南亞波斯地毯貿易的研究中，商貿則呈現為固定某種群體身分的助力。20、21 世紀之交，由於伊朗地毯商人在西方市場遭遇瓶頸，他們嘗試開拓東南亞市場。值得玩味的是，在其向東南亞客戶銷售地毯的過程中，伊朗商人並未迎合東南亞本土趣味，而是試圖將此前在歐美市場積累的東方主義審美觀傳輸至東南亞。波斯地毯在東南亞的流通並未激發伊朗與東南亞國家之間新的文化碰撞，反而強化了伊朗與歐美國家互動所積累的文化表達。

身處同一地域的群體，分享著一定的知識體系，人群遷移又會如何對特定地域的知識體系造成影響？Mounia Chehab-Abudaya 針對便攜式經卷的研究，反映了伴隨人群遷移而發生的知識標準化現象。Abudaya 指出，在以麥加、麥地那為聖地的伊斯蘭世界中，13 至 18 世紀的信徒會在朝聖途中攜帶種類豐富的經卷，包括朝聖指南、禱告錄、便攜式《可蘭經》等。儘管這些經卷的製作者來自波斯、土耳其等不同國家，隨著時間的推移，這些經卷對於聖地的表現方式呈現出了標準化趨勢。梁其姿對於 13 至 18 世紀中、越醫藥知識的研究則呈現知識交流的一個反向趨勢：由跨地域的標準知識回歸地方知識。梁其姿指出，中、越醫藥知識的互通經歷了兩個階段。13 至 15 世紀的第一階段中，越南仍處於中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國的朝貢體制之下，來自中國的官員、僧人與醫生在越南掌握醫藥知識的話語權。16 世紀以來，越南與葡萄牙等國的醫藥知識互通，以及 17 世紀中葉的明清易代，重塑了第一階段的「北（中）—南（越）」知識等級。在 16 至 18 世紀第二階段的中、越醫藥知識交流中，南方醫生開始更有意識地用本土詞彙記載當地的醫藥與治理方法。

伴隨人而流通、傳播的，還有不易被察覺的生活方式，如鄉音、飲食、娛樂。正由於這些生活方式容易滲透民眾的日常生活，故亦可能塑造一個群體的邊界與自我認同。程美寶的研究便呈現了廣州城郊的西關方言如何在 18 至 20 世紀成為涵蓋香港、澳門、上海、舊金山等地的「廣東身分」的標識。鄧津華（Emma Teng）以楊步偉為個案，討論飲食如何促成不同國族、不同職業之間的身分轉換。William Kelly 則指出體育比賽的競爭性、標準化等特徵，能有效地促成地域融合或分化。例如，20 世紀西方體育競技在亞洲的傳播，便與民族主義、泛亞洲主義等政治呼聲密切相關。

上文所提及的遷移都是自發的。在此之外，仍有許多非自主的遷移，如政治流亡、奴隸販賣、走私貿易等。在這類遷移中，哪些因素脅迫或限制人的自主性，而人在這類遷移中又全然失去自由嗎？Tamara Loos 與 James Pickett 對流亡者的研究，體現了非自主遷移的複雜形態。Loos 通過追蹤暹羅王子 Prisdang Chumai 在 1890 至 1911 年間的流亡經歷發現，這 20 年流轉於東南亞各殖民地的經歷，促發了 Prisdang 反殖民政治理念的重大突破。在此期間，Prisdang 曾試圖聯絡各殖民地的佛教力量，並在此基礎上，建立以小乘佛教為軸心的烏托邦共和國。Prisdang 的經歷提醒我們，流亡者的能動性往往取決於流亡地的政治結構、社會環境與文化氛圍。這在 Pickett 針對伊斯蘭流亡菁英的研究中，有著更深刻的體現，Pickett 捕捉到在 19、20 世紀伊斯蘭世界發生的重要政治、文化格局變動。19 世紀以前，伊斯蘭世界大部分都市分享著同樣的波斯菁英文化，特定國家的政治流亡者，往往可以在另一個政體中找到自己的位置，並融入當地的菁英文化。19 世紀下半葉以來的現代化與民族主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義浪潮，則打破了這一綿延的波斯菁英文化保護網。降及 20 世紀初，布爾什維克（Bolsheviks）在蘇俄的崛起，進一步割裂了原本蔓延於中、西亞的波斯文化，而伊斯蘭世界中的菁英也難以在流亡途中重新找到安身之所。

然而，國家層面的政治限制有時也為新的流通提供可能性。Seema Alavi 對於 19 世紀歐曼殖民貿易的研究，便體現了政治限制的這一反助力。19 世紀的歐曼有四股政治力量：Thuwayni、Majid 政權以及英、法殖民者。由於 Thuwayni 與 Majid 親王均試圖通過爭取英、法殖民者的支持來爭奪歐曼的主權，奴隸、軍火貿易便成為兩位親王爭奪殖民者支持的砝碼。這兩種貿易的形態，遂長期由英、法政治格局所形塑。至 19 世紀下半葉，當 Thuwayni 面臨英殖民者的航貿制裁，又無法爭取法國殖民者的支持時，他不得不開闢一條新的航道來維持軍火貿易，從而打開了歐曼對外貿易的新格局。Loos、Pickett、Alavi 的研究，共同反映出個體與政治格局之間的複雜互動：政治格局往往限定了個體的能動邊界，但個體也能在政治格局的縫隙或轉變節點中，塑造出新的商業或社會文化網絡。

在 *Asia Inside Out* 的分卷框架下，*Itinerant People* 所聚焦的是引發時空格局變動的具體、在地的歷史過程。正如前文所提及，對於具體過程、日常實踐的追問，是不少研究者抵禦簡單的「現代化」、「全球化」敘事的方法。這樣的方法對於豐富「何為亞洲」如此宏觀的議題亦必不可少。1990 年代初，David Harvey 曾發問：為何不同社會階層之間的鬥爭越來越多地呈現為地緣政治的衝突？[27]誠然，這一現象部分為歷史實情：全球聯繫的加強使得生產與資源分配在更大的地域範圍內展開；在這一轉變中，原屬特定地域之內的階層差序，會轉而呈現為不同地域之間的政治或經濟差序。不過，Harvey 也提醒我們，地緣衝突的根源依然是人與人之間的衝突。相應地，「亞洲」的特定邊界之所以會形成或隱沒，也是因為人群在相遇、磨合，或形成新的共同體。

27 Harvey, “The Experience of Space and Time,” p. 21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難能可貴的是，本卷作者群不僅將「人」這一歷史主體放回研究視域，更試圖通過人在日常生活中的實踐，來透視「亞洲」整體性的地緣變動與個體生命的關聯。由於史料的限制，我們通常更容易在 Prisdang 王子、波斯貴族等菁英階層的案例中，觀察到個體實踐與宏觀政治結構之間的互動。然而，本卷作者群卻同樣嘗試將視域放在普通人身上：例如立足於中國東南沿海城市的穆斯林翻譯（項霽、馬強）、將地毯工藝推廣於東南亞的伊朗商人（Nages Erami），以及從香港遊走至上海的粵劇藝人（程美寶）等。這些普通人往往不易在歷史中長久留下他們的聲音；然而，恰恰是這些普通人的語言實踐、文化溝通與地域認同，將「亞洲」這一抽象觀念在更廣泛的社會實踐與社會關係中維繫下去。

本卷作者群對不同人群的綿密描摹自然是視角上的突破，但此一視角也使作者群無法深入其他塑造地域格局的重要因素，例如「物」的流通。在〈導言〉中，三位編者實則將「人」與「物」並列為本卷的主題，卻未說明他們僅僅是將「物」視為遷移人群的附屬品，還是視作與人並列、同樣可能塑造地域格局的能動主體。在單篇文章中，作者群更多地是以附屬品的方式來呈現「物」。值得深思的是，「物」以及廣義的思想、知識、習俗，是否可能形成不附屬於特定人群遷移的流通網絡，進而重塑地域格局及社會關係？[28]書中的若干個案，為該議題提供了多元的思考方向。例如，在 David Ludden 針對貝殼王國的研究中，貝殼貨幣以及依賴其流通而運作的商貿網絡，在很大程度上支撐著原住群體的維繫；與之相反，在 Narges Erami 針對波斯地毯的研究中，伊朗商人群體掌握著如何呈現地毯文化意涵的主動性。哪些歷史過程或結構性因素（如市場形態）塑造了上述兩個案例中不同的「人－物」互動？當 Erami 筆下的波斯地毯進一步流通至更廣闊的亞洲市場時，如日本、韓國、中

28 有關「物」塑造社會關係的能動性，參見 Arjun Appadurai, "Introduction: Commodities and the Politics of Value," in *The Social Life of Things: Commodities in Cultural Perspective*, ed. Arjun Appadurai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p. 3-63.

臺灣人類學期刊資料庫

國，是否會呈現出新的文化意涵？地毯的流通又將如何影響這些不同地方的人群對於「波斯」、「西亞」，甚至「亞洲」的理解與想像？

這些論題提醒我們，「物」的流通路徑並不一定附屬於「人」的遷移脈絡。當大規模的人群遷移在特定的地點終止時，「物」卻可能通過其自身的流通網絡，將特定的文化、觀念傳播至更廣闊的地帶。誠然，「物」的遷移與流通或許只是塑造地域格局的動力之一，一部體量有限的論文集無法面面俱到。然而，對「物」之遷移脈絡未盡充分的討論，卻也可能將作者群的視野局限於特定的地域，如大規模人群遷移的起點與終點，或是跨群體交流更顯見的地區，而無法全面呈現亞洲不同地域的分合及轉變。

Asia Inside Out 系列所附的地圖便存在此一視野不平衡的缺憾。在每冊論文集卷首，編者都附有一張世界地圖，以標示每位作者所研究的具體地點。在這三張地圖中，大部分標識的地點均為沿海地區；即使有少數作者關注內陸地區，也往往是兩個國家之間的邊境。[29]同時，在每卷的〈導言〉中，三位編者也反覆強調，他們所著重關注的，是「聯繫」（connection）、「通道」（pathway）、「互動」（interaction）及「交換」（exchange）等主題，尤其注重那些跨越國家邊界與地理分隔的聯結。從編者的核心關懷出發，我們可以作三點反思。

第一，不同地域歷史聯結加強的過程，僅僅會在沿海地區或邊境體現嗎？誠然，由於沿海地區的便利交通，或是由於邊境相對特殊的政治布局，這些地域更容易見證不同人群之間的政治碰撞、商貿交換與文化

29 在本卷 *Itinerant People* 中，編者將 8 位學者的文章標註在沿海地帶，4 位學者的文章標註在內陸地帶。在第一卷 *Changing Times* 中，8 篇文章被標註在沿海地帶，3 篇位於內陸地帶。在第二卷 *Connected Places* 中，9 篇文章被標註在沿海地帶，3 篇位於內陸地帶。同時，如筆者在正文中指出，這些涉及內陸地帶的文章亦多聚焦於不同國家之間的邊境地域，Matthew Mosca 在第二卷中針對喀什米爾情報人員的文章便為一例；參見 Matthew Mosca, “Kashmiri Merchants and Qing Intelligence Networks in the Himalayas: The Ahmed Ali Case of 1830,” in Eric Tagliacozzo, Helen F. Siu, and Peter C. Perdue, eds., *Asia Inside Out: Connected Place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 219-242.

臺灣大學圖書館期刊資料庫

交流。然而，這些歷史過程同樣可能在內陸與腹地發生。在此類政治、商貿、文化互動深入內陸腹地的過程中，「物」的流通往往扮演著重要的角色。以 Abudaya 筆下的便攜式經卷為例，正由於這些經卷在歐亞內陸的廣泛傳播，不同國度的人群對於聖地的想像逐漸呈現標準化的趨勢。誠然，三位編者或許並非有意呈現上述歷史聯繫的不平衡分布。未來的研究者則應當補足我們當前的不平衡認知，同樣探討政治、商貿以及文化互動如何影響不同內陸地帶的人群對於「亞洲」的感知。

第二，會引起「亞洲」這一地理區域及地緣觀念變動的，僅僅是聯繫、聯結這樣的歷史過程嗎？既有聯繫的中斷、新邊界的固化，是否也會同樣深遠地重塑「亞洲」呢？例如，James Pickett 筆下綿延的波斯菁英文化網，便在 20 世紀蘇俄民族主義的浪潮中面臨中斷、割裂的轉折；在 Pickett 的案例中，恰恰是此種既有聯繫的中斷，在重塑波斯的文化邊界、「亞洲」的西域格局，以及「亞洲」與「歐洲」之間的關係。邊界與聯繫本是一體兩面的歷史因素，我們不必將兩者分割看待，但也不應當出於對「聯繫」的強調，而無意中忽視了「邊界」的歷史作用。

第三，以呈現人、物流動的複雜性為基礎，這部論文集是否向我們揭示了使「亞洲」得以內部聯結的新動力（dynamic）與結構（structure），又是否為我們提供了分析歷史過程的新範圍（scale）？2000 年以來，「全球史」、「大分流」、「帝國比較」等議題之所以重要，正因為這些議題提供了追溯歷史聯繫的新方式，亦不斷重塑歷史分析的格局。例如，彭慕然等人對於「大分流」的討論，揭示新、舊世界的聯結打造了突破性的「中心－邊緣」規模；濮德培等人針對內亞邊地的研究則提醒我們，亞洲帝國更為廣闊的疆域規模，並未真的限制這些帝國在 19 世紀前應對跨國競爭的機會；卜正民、達瑞克等人對於普通民眾、物質文化的關注，則將更為豐富的歷史主體納入我們的視野中。頗為遺憾的是，*Itinerant People* 並未在個案的基礎上，針對上述重要議題提供明確的回應。然而，從 *Itinerant People* 所涵蓋的話題來看，該論文集本可能為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全球史」、「大分流」、「世界體系」等議題提供新的思考方向。例如，上述重要研究所立足的，主要仍是由軍事擴張、商業貿易所打造的聯繫。*Itinerant People* 則涉及了宗教、知識、生活方式等其他因素所塑造的跨區域聯繫。這些因素得以聯結「亞洲」的方式，與經由戰爭、商貿打造的地域格局有何不同？通過對於這些因素的考察，我們是否可以在「中心－邊緣」的聯結方式之外，尋找到新的地域關係或地域秩序？宗教、知識、娛樂等因素，又是如何重塑物理空間與社會空間之間的互動，進而影響用以協調空間、資源、人口的制度？若論文集編者能就這些問題作一定提煉，或是讓作者群圍繞這些議題展開更具針對性的辯論，或許能使本書更為緊湊、深刻。

四

「聯繫」與「邊界」是人類社會中的恆常主題：它們時常相互衝突，又在衝突中彼此塑造。對人文社科學者而言，如何平衡這兩個視角，又如何通過它們反觀現實世界的挑戰，是二戰以來愈加迫切的問題。二戰前夕，年鑑學派的領軍人物之一費弗爾（Lucien Febvre, 1878-1956）曾通過「聯繫」與「邊界」這兩種視角去思考萊茵河，並以如下話語作結：「儘管存在著政治仇恨和衝突，萊茵河依然是一條聯合各個民族的河流。」[30]費弗爾所面對的是一個國族對立日益嚴峻的世界。在那樣一個世界裡，萊茵河被視作政治邊界的象徵，亦頻頻成為政治爭奪的對象。正是應對那樣一個世界，費弗爾指向了萊茵河的另一面與人類社會另一種的可能性：交流與聯繫。如今，距費弗爾完成《萊茵河：歷史、神話和現實》（*Le Rhin. Historie, mythes, et réalités*）一書（1931）已近 90 年。在當今世界，「邊界」所促發的政治、社會、文化挑戰變得愈加複雜，

30 呂西安・費弗爾著，許明龍譯，《萊茵河：歷史、神話和現實》（瀋陽：遼寧教育出版社，2003），頁 20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而我們亦開始明白，簡單地增強不同地域、階層、文化之間的「聯繫」，並不能完全應對圍繞「邊界」而展開的爭端。在這個時代，我們亦開始面臨跨地域「聯繫」所帶來的煩惱。只是當新的聯繫、新的（經濟、社會、文化）關係，已通過種種「現代化」、「全球化」的歷史過程而成形時，我們無法再回歸 20 世紀（抑或 19 世紀）的「邊界」以應對 21 世紀的煩惱了。我們有著更大的責任去實現不同領域間的交流與合作，並以合作的方式去洞悉宏觀歷史進程的微觀後果，以及微觀歷史互動對於宏觀政治、社會、經濟結構之影響。*Asia Inside Out* 系列的作者群正在這個方向上邁出了第一步。

（責任編輯：吳昌峻　校對：黃方碩　詹前倬）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